

往事如昨

我当报务员的日子

范志军

一

1965年秋,我顺利考上了烟台第二中学教改六级实验班。当时我家住在芝罘区大海阳的一座大杂院里,每天放学都要经过小黄山的王家莹,烟台港务局的电台就建在那里。每当路过那里的时候,总听到里面传出嘀嘀嗒嗒的声音,我情不自禁地向里面张望,可什么也看不见,因为那里四周是高墙围绕,大门紧闭着,墙头上还有铁丝网,高墙外面分布着几十根高耸的天线杆,我越发感到神秘和向往,当时想,要是毕业后能到这里工作,该有多好啊!

1968年秋,初中和高中“老三届”毕业生统一进行了分配,有的在本市就业,有的分配到县城,也有待业及知青下乡的,而我,真的被分配到了烟台港务局,先是当装卸工。1970年春节后的一天,当时的港务局负责人赵升堂同志找我谈话,说管理局电台的无线报务人员出现了青黄不接,急需培养新的报务员,局里初选出四名人员报到上级,最终只批准了我和苑英强,希望我们不要辜负组织上的期望……

二

第二天上午,我和小苑被电台的程绍凯台长接走了。程台长先是带我俩对电台简单地观看了一番,介绍了电台的报务房、机务房、译电室等处后,他问我们:“组织上分配你俩来进行报务培训,将来干报务工作,你们愿意吗?”“愿意!”我俩异口同声地回答。程台长点了点头,又问:“为什么?”我脱口而出:“我早就想干这个工作了。”“还有呢?”程台长看我俩没有马上回答,就用他特有的低沉而凝重的声音说道:“报务工作是一项保密性很强的工作,不该知道的绝对不能打听,不该讲的绝对不能乱讲,要上不告父母,下不传妻子儿女。作为一名报务人员,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,也不能泄露党的机密……”当时程台长还谈了许多,要求我们回去好好想一想,并尽快把保密守则背下来。

出了办公室,我好奇心未消,又到各处看了一下。在器械室里,我发现了一支苏式安装弹鼓的PPD—34冲锋枪,忍不住反复观摩操作了好一会儿。后来我的第一次射击,用的就是这支枪。在高大宽敞的报务房里,听着那像鸟叫如流水的电报声,看着那发报时不断闪烁银光的电子管,我久久不愿离开。出了报务房门口,只见高墙内的院子很大,不仅栽有花草果树,而且在空地还种有玉米、地瓜和蔬菜,院子里有一口井,可以打水吃。电台备有发电机,不用问我也知道原因,可既然有自来水,为什么还要打水井?问了老同志才知道,这是战备井,以防断水备用。

当天回到家,我抑制不住激动,写下了进入电台的第一篇日记。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诗句:

在祖国的蓝天里,
在辽阔的大地上,

在高耸着的天线杆旁,
闪耀着银灰色的光芒。
啊!革命的千里眼、顺风耳,
前进!把红色的电波传向祖国的
四面八方!

三

三天后,我俩正式开始了报务培训。培训我们的老师叫刘正棠,是一名老资格报务员,为人正直,作风严谨,技术过硬,每分钟收发电报能达到150多电码,压码抄报能达到6个。所谓压码抄报,是指在比赛中,以每分钟单位时间内抄报速度计算,而不是以抄报完的时间计算,以压码6个为例,即使发报完毕后还有6个电码没有抄写,也可以继续凭记忆抄写完成,不算超时。对一般报务员来说,能压3个码就已经相当不错了。

我们先背报码,就是把每个电码规定的点划背熟练,包括10个阿拉伯数字、26个英文字母,还有逗号、句号、问号、引号、叹号、长破折号、连字符等电码。一天的工夫,我就背得滚瓜烂熟了,我不无得意地对刘老师说:“太简单了!”刘老师听后不置可否地说:“简单?你抄报试试!”

背熟报码后,刘老师在我们练习抄报前,先教我们正确的削铅笔方法以及握笔抄写的姿势,教我们书写阿拉伯数字及英文字母的快捷写法,并告诉我们,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掌握不好,也会直接影响到抄报的速度,要反复练习,直到得心应手再练习抄报。我上手一抄才发现,抄报时根本就没有思索的空间,背得再熟也不行,完全靠第一反应。我手忙脚乱,抄得一塌糊涂,这才明白了刘老师前面说的话。

收报业务熟练到一定程度后,就开始学习发报业务。当时用的是立式电键(还有跪式电键、扫拨电键等),电键的通断触点相互间的位置一开始调得比较高,弹簧也调得比较硬。刘老师检查了我俩的右手食指和中指,要求手指甲要剪得低于手指肚顶,当时我还很不理解。

一个星期下来,我的食指指甲盖从上到下裂开了,都渗出了血,虽然缠上了胶布,可还是一按电键就钻心地疼,直冒冷汗,真是让人难忘!当时我想到了江姐,在渣滓洞面对钉竹签的酷刑,她革命的意志真是坚如钢铁!到训练结束时,我食指和中指的手指顶已经磨出了硬硬的老茧。

在发报训练中,为了尽快提高发报的速度,我一度出现了发报抢码的现象。刘老师发现后告诫我说:“发报速度的提高不能靠抢码,必须在现有速度十分稳固的基础上,不知不觉地小步提速才行,靠有意识地去强行抢速度,往往会使得你的手法出现偏差。手法偏了,不仅会影响和限制你以后发报速度的提高,而且还会影响对方抄报的准确性。手法偏了,开始还好纠正,一旦偏得严重了,就很难纠正过来。”

培训结束以后,我的发报速度达到每分钟120个码,抄报速度达到了130个码。到如今,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,可拿起电键,我还能很顺利地发报。

通过学习报务我才知道,电报这种曾经最紧急、最迅捷的通信方式还分有线报务与无线报务。邮电局的电报业务基本上都是有线报务,其发报电码都是通过专用线路进行传输,没有天电及外界电波的干扰。现在,邮政部门已不办理此项业务了。而无线报务则是电波传输,在通信联络中,每时每刻都要受到天电及外界电波的干扰,特别是在电闪雷鸣的天气里,干扰更是严重,因此在最后的训练阶段还要进行抗干扰的报务训练。

四

一切都过关了,就是上机实习,没有收发报业务的时候,我们就在频道上值守,当收到有信号联络本台时,对接上以后,就转到特定的高频频道进行无线报务联络收发。

值守时,要求随时记录外电出现的比较重要的情况,所以不敢多喝水,上卫生间都是疾步小跑,生怕漏掉应记录的情况。对重要的情况要及时报告,如在本台的海事辖区内,船舶出现了险情,收到了“SOS”险情盲发求救信号时,就会特别紧张,因为这时候船舶所在的位置、天气的状况可能非常不好,天电干扰也特别大,船上的报务员发报会受到船舶颠簸影响,出现手法不正常的现象,需要特别集中精力盯住发报手法、音质收听抄报,哪里出现了疑问,要立马回电要求重发,一旦确认了经纬度坐标后,就要马上报告。程台长每天都要对报务日志进行批阅,如果发现问题,就要求我们整改。

收发报中,对一般的电文,如天气情况、船舶进出港请求、外来船舶进入本区航线位置、需要供应物资食品等,都是使用明码电文,电文大都较短,报务员自己都可以对照明码本对电码组进行翻译,然后交给通信员传递。对于机密电文,则要先由译电员用密码译成电码后,再由我们报务员发出电报,至于发的电文内容是什么,我们报务员一概不知,只是按照电码进行收发报。

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,我国的无线电报业务就已经告别了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里通过电键通断方式发送摩尔斯电码的最原始技术。现在,在电影电视剧里出现的首长在电台旁口头下达指示,报务员听到后直接将电报发出,或是用手指头随便在什么地方点几下(表示嘀嗒点划,类似灯光通信),对方看到后,就知道发出的是什么内容,这不过是想当然的艺术化。别说密码电报需要通过多个环节的解密译电,即使是明码报文也需要一组组翻译才能阅读,要想不经翻译而直读,除非把汉语通用的五六千个文字的明码电码全部熟练地背下来才行,这对于明码电报来说,既没有

必要,也没听说过有人全部熟记下来。

五

经过半年多的培训,我的各科成绩均是优秀,终于能够独立值机了。单独值机时间不长,征兵就开始了,我刚好符合当兵的年龄,从小的爱国主义教育、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使我无比向往军营这个大熔炉。我向往红领章、红帽徽,无比崇敬《红旗飘飘》中长征路上英勇无畏的老红军、中国的保尔·柯察金——《把一切献给党》的作者吴运铎以及董存瑞、黄继光、雷锋这些光辉形象,我要献身国防、保卫祖国。

然而,我的报名却没有得到批准,答复是培训一名报务员不容易,况且电台急需新的报务人员,因此不予批准。我得知后有点绝望,但并没有死心,于是越过电台的领导,反复地去找带兵的领导,找管理局的领导,最后终于得到了批准,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后来,带兵的领导告诉我,他们与管理局的领导商议的意见是,我到部队后继续从事报务工作,等复员回来后再回电台。

1970年12月下旬,我与港务局其他十几名新兵一同被送到了独立一师师部新兵连,集训到1971年3月8日。临下连队的当天上午,我所在的新兵排列队集合,每个班点出了一名新兵出列,我也被单独点名留下了,全排其他人被分配到军区直属单位,我与另外三名新兵则直接分到了师部特务连,我被分到了侦察排。

单独点名出列时,我心里暗喜,还以为要去通信连电台,但结果却是大失所望。为什么与带兵的领导对我说的不一样呢?我疑惑了很长时间才搞明白,带兵的领导是独立一师一团派出人员,我们烟台港这批兵本来是要去一团的,征兵结束后分配方案有变动,所以就分到了师部。知道了这个缘故,我明白了,我将永远与报务工作无缘了。

在部队,每当路过通信连,听到那熟悉的嘀嘀嗒嗒的声音,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静听一会儿,那声音比什么歌都好听,那声音刻骨铭心啊!

六年多的军旅岁月,很快就过去了。离开部队返回烟台的第二天,我就迫不及待地去看望了老领导和同事们,虽然高高的墙内格局没有变化,但是高墙外的变化却不小。原来的林荫小道变成了宽阔的马路,原来那横七竖八用汉白玉雕刻的、与真人实物大小相当的文官武将、石人石马不见了,那镂空的二龙戏珠的精美碑雕也不知去向,随之而来的是一座座楼房。立在半山坡上突兀的电台,与周围现代化的建筑显得格格不入,十分另类。

我短暂的报务生涯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,但那嘀嘀嗒嗒的电报声却从没有在我的心中消失过。每每听到,心头总是一阵悸动。



作者(左)和电台刘老师